

守护传统：牛津大学的自由教育

彭道林，曹丽梅^①

(湖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在牛津大学的发展历程中，自由教育的传统对其影响深远。自中世纪起，牛津大学便秉承独立自主的精神，以培养社会精英人才为目标，以学院制和导师制为模式，以“七艺”、古典学科、人文学科为核心开设课程，培养了大批德性与理性兼具的精英人才。与功利主义、工具主义相对，牛津大学始终注重传授普遍知识，守护、传承和发展自由学术传统，并由此捍卫了其世界一流大学地位。这种成功经验对于我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有诸多启示。

关键词：牛津大学；传统；自由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18)10-0084-08

Upholding the Tradition: Liberal Education at Oxford University

PENG Dao-lin, CAO Li-mei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Oxford University, the tradition of liberal education has had a profound effect. Since the Middle Ages, Oxford has been upholding the spirit of independence and devoting itself to training talents with the collegiate system, tutorial system, and unique courses such as the “Seven Liberal Arts”, classics and humanities. In contrast to utilitarianism and instrumentalism, Oxford has been focusing on imparting general knowledge, guarding, inheriting and developing the tradition of academic freedom, which has defended its world-class status. Its success can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for China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construction.

Key words: Oxford University; tradition; liberal education

一、自由教育的演变与内涵

什么是自由教育？历史上，自由教育最早出现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曾将其定义为适合自由人的教育，并认为它能够使人更接近智慧，而“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和原因的知识”^[1]。同时，发展自由教

育需具备两个条件：闲暇和自由学科（liberal arts）。所谓“闲暇出智慧”，闲暇能使人的身体与心灵保持自由，使人做自己的主人，从而成为自由人。而自由学科通常是指“七艺”，即“语法、修辞、逻辑”（三艺）和“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四艺）。^[2]自由学科是自由教育的载体，通过学习自由学科人，可以发展自己的理性，于当前和具体的问题中解放出来，达到对

① 收稿日期：2018-07-2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BIA170175）

作者简介：彭道林（1969—），男，湖北天门人，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从事高等教育基本理论研究；曹丽梅（1996—），女，湖南郴州人，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从事高等教育基本理论研究。

内在价值的关注。至中世纪，自由教育一度沦为神学的附庸，“七艺”也成了学习神学和皈依上帝的基础。文艺复兴时期，随着“人文主义”的复苏，自由教育获得解放，人们重新开始注重古典人文学科的学习。在英国，弥尔顿《论教育》和洛克《教育漫话》的广泛传播，使得自由教育与绅士教育或博雅教育相联系，强调通过自由学科以广泛的知识来培养具备优雅风度、良好教养、富于智慧的绅士。^[3]1809年洪堡在德国创办了柏林大学，这是高等教育史上划时代的事件，大学不再只是教学的中心，也成了研究的中心；大学不只是传授知识的中心，也成了发现真理、拓展知识的中心。在这一划时代的转变中，自由学术及自由教育的思想进一步得到弘扬，自由教育也进入到一个新阶段。洪堡的研究思想中，特别说明了科学不是一般的科学，而是纯科学，也就是自由学术。与洪堡一同开创了柏林大学的施莱尔马赫也说得很明白很具体，“真正的大学，即作为科学团体的大学，仅仅体现于哲学院中”，其他的“部门只会得到从属性地位”，哲学院“必然属于首位”^[4]，而哲学正是自由学术的代表。19世纪中叶，自由教育又开始以心智训练(mind discipline)为主要目标，其领军人物纽曼在《大学的理想》中指出，“自由教育……就是心智、理智和反思的操作活动”^[5]。这一观点到20世纪被美国芝加哥大学校长赫钦斯发展，“教育的目的是改善人”，“这就是适用于自由人的教育”，“所谓改善人，意味着他们理性、道德和精神诸力量的最充分的发展”。^[6]如今，自由教育思想经过变革，又以通识教育的形式对大学教育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古今学者们对自由教育进行了诸多的论述，虽然他们的表述不尽相同，但综合自由教育的性质、内容和目的等方面的特点可以得出，自由教育即以人的理性与智慧的自由发展为目的且主要依托自由学术而进行的教育。^[7]它内涵丰富，强调教育的基础性、普遍适应性及其内在价值，它关注人本身，将教育的最终目的聚焦在培养充分自由发展的完整的人之上。

二、自由教育传统在牛津大学的具体体现

自由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英国乃至整个西方高等教育的基调和框架。作为英国最古老的大学，牛津历史悠久，学术传统深厚。这所大学自创办

以来便以自由教育为其思想根基，在8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无论外界如何风云涌动，牛津始终保有其特有风骨，顽强的坚守、传承和发展着自由教育的传统。当然，为顺应时代的发展，牛津大学也进行过改革，但这种改革是渐进式的，是稳定中的发展、保守中的超越。如今，历经九个世纪仍傲居世界一流的牛津无疑验证了其坚守的价值。深入研究牛津大学的培养目标、学科设置、学生管理、培养模式、学业评价和学校管理，不难发现其中自由教育的历史脉络。

1. 培养目标：秉承古希腊的精英追求

牛津大学的人才培养理念可追溯至古希腊时期的自由教育思想。亚里士多德曾将自由教育定义为适合于“自由人”的教育，而只有奴隶主、贵族阶级或有闲暇时间的自由民才能被称作“自由人”。自由教育自出现时起就旨在培养社会上层精英，这一点在牛津大学创办初期也有鲜明的体现。在中世纪，为了满足教会对于神职管理人员的迫切需要，牛津大学应运而生。当时的牛津大学主要培养有一定文化素养、服从上帝、为教会效忠的神职人员。而神职人员正是知识学问的掌握者、社会上层的操控者。到11世纪末12世纪初，牛津大学逐渐发展成为英国的学术中心，为了顺应社会的需要，又增设了法律和医学等学科。虽然其目的也是培养法律和医学专业人士，但当时能够从事这些职业的也都是社会中颇有学识和影响力的人。可见，牛津大学自创办时起培养的是社会上层精英。

文艺复兴时期，受欧洲人文主义思潮影响，加之弥尔顿《论教育》和洛克《教育漫话》的出版，英国自由教育开始与绅士教育相联系。作为英国最古老的大学，牛津大学便是以绅士为培养目标，其理念即为“培养有教养的人，而不是知识分子。就大学毕业生而言，有教养比有高深学问更重要”^[8]。纽曼1852年出版的《大学的理想》是牛津大学几百年来自由教育思想的写照：“自由教育造就的不是基督教徒，也不是天主教徒，而是绅士。”^[9]“绅士是一个从不伤害别人的人”，是“有文化修养”、“具备思想和行为上一切优良品行”的人。^[10]大学是“一个传授普遍知识的场所”，“大学的光荣在于培养完全有教养的人”，“培养有文化修养的人是教育的真正的也是唯一的目的”。^[11]对此，牛津大学史学者谢尔顿·罗斯布莱特也说，“纽曼的大学理念，既是英国的大学理念，也是牛津的大学理念。如果说纽曼关于牛津大学的理念是对他19世纪20年代学院生活的回忆，也许更准确”^[12]。

当时牛津所奉行的“绅士教育”的原文仍为“lib-

eral education”，与古希腊的自由学科“liberal arts”同源，这是对传统的一种守护。同时，这种培养精英绅士的追求不仅与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所强调的理性与美德异曲同工，更凝聚了英国作为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贵族精神于一体，体现在牛津人身上即是稳重、理智和高雅。当外界出现改革潮流时，牛津人从不随波逐流，而是坚持自己的治校哲学，保守传统，稳中求进。当政治论风行，牛津仍致力于依靠教学和科研培养人才、提升学术，并由此来理性地服务社会。当职业教育普及，牛津仍崇尚自由教育的传统，注重纯科学和哲学的探索，将人的理性的完满实现作为教育的目的。

进入 21 世纪后，牛津大学的人才培养战略目标更加明确。2005 年，牛津大学颁布的《2005—2006 学年至 2009—2010 学年综合规划》提出，要“为本科生和研究生提供优质的教育”、“吸引、培养和留住全球顶级学术人才。”^[13] 2013 年，牛津大学又在其 2013—2018 发展规划中提出，要“致力于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应其个性发展的高质量教育，使学生能在牛津的培育中发展能力，增长智慧，形成一定价值观，并能将其运用于生活和工作”^[14]。而这其中的“高质量教育”、“智慧”、“能力”和“价值观”正是积淀了千百年的牛津大学自由教育传统所强调的，更是牛津大学成功的秘诀。牛津大学副校长考林·卢卡斯曾指出，“最好的学生和最好的教授来到这里，这是牛津可以经历这么多年生存下来的原因”^[15]。

几个世纪以来，牛津大学培养了数以万计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诗人、企业家和银行家。外界熟知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和物理学家霍金等精英人才都曾在牛津大学求学。英国哲学家罗伯特·罗素在谈到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时就这样指出，“他们特别适合一流人才”^[16]。这与牛津大学对自由教育传统的守护是分不开的。可以说，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洛克、纽曼，牛津大学秉承了其源自古希腊的精英情怀，在自由教育的传统中，引领学生追求灵魂和精神的卓越，吸引和培育了无数精英人才。

2. 学科设置：融古通今的人文情怀

学科在一所大学中占据着重要地位，高水平学科是培养精英人才的基础，是进行高质量教学的前提，更是促进科学的研究的平台。牛津大学的学科设置一直以深厚的人文传统为根基。牛津大学校长安德鲁·汉密尔顿 2011 年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谈及其新设立的政治学院课程时曾说道，“布拉瓦尼克学院也将把人文学科引入核心课程，帮助学生们应用

历史的、文学的、哲学的启示来领导政府，如用莎士比亚的《尤里乌斯·恺撒》来谈判斡旋，用亨利五世的例子来教领导艺术。”^[17] 这样的理念不是突然提出的，它蕴含了深厚的历史背景。

自创办初期，牛津大学便设立了 4 个学科（文科、法科、神科和医科），与同时期的单科大学相比，具有更鲜明的人文特色，体现了其自由教育的理念。随后在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学科设置不断优化，在坚守人文传统的同时，又顺应了时代的发展需求。

中世纪的牛津大学偏居一隅，非罗马教皇直接管辖所能及，在一定程度上享有了学术自由，这便使牛津能够传习除神学以外的亚里士多德学说和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世俗知识。较之同时期的巴黎大学，牛津大学的学科和课程基本上还是以古希腊的“七艺”为思路和框架，不仅开设了“七艺”中的文法、修辞、逻辑三门基础学科，且对其余“四艺”的教学仍保有一定的重视度。同时，自然哲学、道德哲学和形而上学哲学也是重要的教学内容，所用教材主要是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其中，文学课程所占比重较大，全部用拉丁语进行教学，是基础性的学科。学生入学后必须通过文法课学习基本的文法知识和拉丁文才能听懂其余课程。这是由于牛津人十分强调对原始资料的掌握，在人文教育中尤其注重原著阅读和文本研究，并形成了其在哲学上的实证主义传统。牛津大学汉学教授庄士敦曾提及他到北京时听过胡适的一个讲座，题为《柏拉图与中国的教育》，但胡适对柏拉图的解释似是而非，显然是没有读过原著，而当时在牛津是要求学生用古希腊语仔细阅读柏拉图的原文的。^[18] 直到今天这一传统也仍被延续，如学习英国文学的学生就要学习古典语言，研究文艺复兴以前的历史、文化和宗教。

15 世纪至 16 世纪，文艺复兴促进了欧洲大学课程内容的改革，古典人文教育随之成为牛津大学的特色。古典拉丁语、希腊文、希伯来文以及用这些语言写作的大量古代作品是学校的重要教学内容。^[19] 坚持主张古典著作学习的西德尼·史密斯在 1809 年第五期《爱丁堡评论》上写道：“古典著作学习构成了牛津大学的教育基础。古典文学是牛津大学的主要科目，……这样的一种教育制度将更有价值。”^[20] 当然，16 世纪以来，随着时代的发展，牛津大学也开设了物理学，同时引进了法国数学家和哲学家笛卡尔以及英国哲学家洛克的学说。

18 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出现，自然科学发展迅速。此时牛津大学的学科范围增大，一些新的自然科学开始受到重视，牛津先后设立了植物学、化学、

实验哲学、临床医学、解剖学、诗歌、盎格鲁—撒克逊语言等讲座职位。^[21]19世纪，牛津大学的学科领域继续扩大，出现了英国文学、比较语言学、古典考古学、应用机械学、自然科学、化学、生物学、病理学、逻辑、古代历史、道德和形而上学哲学、理论数学、植物学、采矿学、新拉丁语言哲学、机械与土木工程学、国际法学、政治经济学和英国法律等。其后，理科教育一直在加强，但古典人文学科课程仍旧占据着核心地位。对此，埃里克·阿什比指出，“这一时期，牛津大学的绝大多数课程甚至与14世纪的教学内容没有什么区别，仍然以古典人文主义教育为中心”^[22]。

从20世纪至今，牛津大学的人文学科仍极具威望。在英国高等教育基金会组织的4次科研评估考核中，牛津大学的历史、法学、英语语言文学学科连续四次都排在英国大学中的榜首。曾任牛津大学副校长的布洛克这样指出，“牛津从来不认为发展新的学科可以损及它在人文学科领域尝试新的突破，同时维持人文学科研究的高水平，在这两者之间保持一种平衡”^[23]。总之，无论在哪一个时期，牛津大学都从未舍弃人文课程的重要地位。

当然，坚守人文课程传统不意味着牛津没有适应新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需求。20世纪末21世纪初，牛津大学不断调整和整合学科课程，在其本科专业中，文科和理科几乎各占一半，形成了文理交叉并重的格局，切实促进了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结合。同时，牛津大学还开设了大量的双学科专业课程和三学科专业课程，如“历史和经济学”等，既体现了现代知识既分化又融合的发展趋势，也传承和发展了传统的自由教育理念。

3. 学生管理：沿袭跨越多个世纪的学院制

学院制是牛津大学最基本的管理模式，承载了牛津跨越九个世纪积淀而来的办学传统，使得牛津在世界众多高等学府中独树一帜。牛津现仍有部分学院称为“Hall”，如圣埃德蒙学堂，其中的“hall”一词与中世纪时学生寄宿房屋内带壁炉的大厅“hall”同源，足见其历史之悠久。不同于大多高校按学科分类而成的学院，牛津现有的38所学院实则为38个不同的学术共同体，每个学院因其创办人、创办背景不同而招收不同层次、不同系别、不同专业的学生。这些不同领域的顶尖学生汇聚在一起，相互交流研讨，时常产出世界一流的研究成果。每个学院也都是独立的法人，拥有很大程度的自治权。

牛津大学创办学院的初衷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培养人才，二是为学生营造一个精神家园。^[24]在学院里，牛津人始终坚守自由教育的传统，注重本科

教学，辅以寄宿制管理、导师制教学，培养了无数品学兼优的精英人才。而学生精神家园的营造则体现在其优美古朴的学习生活环境、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和悠长久远的文化习俗中。

牛津大学的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的建筑群体，这些建筑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反映并延续了一代又一代的牛津人对其学院的特有情感。它犹如牛津大学在漫长发展中遗留的活化石，刻画了牛津在飞转的时空中所沉淀的历史联想。步入这样一个古朴的学院环境里，学生不难沉浸于学习思考之中，达到自由教育的理想境界。阿诺德在他的散文诗中这样写道：“牛津以她不可名状的神韵，在不断召唤我们走近我们大家的目标，最完善的理想，简而言之就是‘美’。而‘美’即是‘真’的另一面。”^[25]

各学院还保留着许多古老而奇特的传统。如每逢重大或正式的场合，牛津大学的成员都必须穿学袍。这种学袍是由中世纪各级神职人员所穿的不同教袍演变而来的，可谓别具一格。此外，高桌宴会亦源于牛津的一个古老传统。过去牛津的教员都是单身的神职人员，他们以学院为家，晚餐时常聚在一起切磋学问、饮酒聊天，这一形式发展到后来便成了一个具有浓厚牛津传统特色的社交场合——高桌宴会。参与这样的宴会可以让学生有机会结识各种精英人物，如艺术家、史学者、工程人员、经济学家、哲学家等，既丰富了学生的生活，又扩充了其眼界。

可以说，学院就像牛津人的家，它气氛团结融洽，尽可能在为学生提供最完备的学习和生活物质的同时，又在情感上给予学生一种归属感，以至于毕业后许多学生仍对牛津有强烈的“学院情节”。涂尔干曾指出，“学院的直接功能在于能为学生们提供道德与物质上的庇护，……对于那些最年幼的孩子而言，学院创造的道德环境甚至可以取代家庭的教育环境”^[26]。加拿大散文家和大学教授斯芬·B·利考利曾两次访问牛津大学，对牛津大学的学院生活感慨道，“对大学生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是他周围的生活和环境。所有他真正学到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靠自己智力的积极参与，而不是作为被动的听者学到的，……大学生必须生活在一起，一起吃饭，一起讨论。经验表明，学生的心灵就是靠这种方式真正地成长起来”^[27]。而这种心灵的成长正是自由教育的真谛，它在学院制这一延续了几个世纪的传统中生根结果，传承至今，成为牛津大学著称世界的法宝之一。

4. 培养模式：以奉行个性教育的导师制为主线

如果说学院制是牛津大学的一顶“皇冠”，那么

导师制则是其“皇冠上的宝石”^[28]。它源于学院制，与学院制共同构成了牛津最具情怀与魅力的古老传统，是牛津大学进行自由教育、培养本科学生的一种独特制度。

导师制在牛津大学有着数百年的历史。在牛津大学形成初期，一群学生围着一名神学家学习经文的模式中，导师制便开始萌芽。牛津大学成立后，学生散居于牛津城中，常与市民发生冲突，造成不便。为了加强管理，各学院便派遣专人指导学生的生活和学习，使其遵纪守法，安心学习，这时导师制便开始成形。17世纪，《劳德规约》更是将导师制确立为牛津大学的重要制度，规定每个学生都要配备导师。到近代，当学生跨进牛津的大门，就有一位品行高尚、学识渊博的导师跟着。导师不仅要监管学生的学业，还要就其生活的方方面面给予指导，如告诉学生应该交什么样的朋友、告诫学生不要赌博、督促学生定期给父母写信等，最终促使学生成为一名言谈得体、知书达理的绅士。到了现代，除了生活的指导外，导师对学生的学业指导更为系统。导师每周都要与学生见面，实行一对一或者一对二的针对性辅导。学习课程前，导师会与学生共同制定个性化的教学计划。学习过程中，导师会根据实际情况，为学生提供讨论题目和参考书目，指定学生去听一些与之相关的课程和讲座，并要求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写出论文。学生论文完成后，导师会与学生一起就文章进行辩论。这样的辩论实是保留了古希腊柏拉图“学园”中重视讨论和辩论的传统。15世纪时牛津更是将其作为一种制度，文科学生必须要参加文学学士学位初试，与一位教师在文法和逻辑上进行辩论。^[29]

纵观导师制发展的历史不难看出，导师制对牛津大学自由教育的发展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促进了学生品格的塑造、兴趣的培养和智慧的增长。自文艺复兴时起，牛津大学便致力于培养有理想人格、受过古典文化熏陶、思辨能力强、且出入各种场合都能够礼仪周全应对自如的人。为了达成这一目标，牛津大学自创办之初即为学生配备了导师，对其耳提面命、言传身教。当然，这对导师的要求也非常高，不仅要学识渊博，在专业领域有很深的造诣，而且需品行端正，能够成为塑造学生灵魂的人。

对学生而言，身边能时常有一位这样的人物关心自己、督促自己，久而久之，也必然会被教化，从而在性格和行为上有所长进。在培养学生兴趣上，一方面，导师本身便是学生所选领域的权威专家，不仅给了学生一个与知名学者交流的绝佳机会，也为学

生树立了良好榜样。另一方面，导师会针对学生进行个性化的教学。其教学地点不限，可以在办公室，也可以餐厅或者酒馆里，气氛轻松而随意。教学计划也是与学生一同商讨得出的，更有利于激发学生的主动性。教学过程中，所有问题都没有固定答案，导师仅是一步步的提问，引导学生通过自己的思考研究得出满意的答案。在增长学生智慧上，导师制特别强调训练学生的思辨能力。导师会定期给学生布置讨论题目，对于讨论涉及的知识点，学生不但要了解，还要有自己的观点，展现自己的逻辑思维过程。在导师的不断质疑与提问中，学生的优点和缺陷都能被老师尽收眼底，因而导师便能更全面地了解学生，帮助学生探索自己的知识边界和能力极限，最终突破自我、增长智慧。

加拿大斯蒂芬·利考利教授也曾称赞导师制是牛津成功的秘诀，“牛津给了学生某种东西，一种生活和一种思想方式”，“他的导师，对他的学习和研究发生兴趣，就会对他喷烟，直到在他的心里点燃火苗”。^[30]在导师制的教学下，学生获得的不只是些现成的事实、数据和理论，而是搜寻、理解和分析事实、数据和理论的能力，和利用这些事实、数据和理论来支持一种观点或推翻一种理论的思维。更重要的是，在导师的熏陶下，学生将对自己的学习和生活产生更本真的领悟，在心灵上获得更大的自由。这也是常为人们说起的“牛津教你有中无”的深层内涵。^[31]虽然从中世纪到今天，导师制因其成本费用高昂而对各学院造成了较大经济压力，但牛津却从未放弃对导师制的坚守。晨钟暮鼓间，其传承数百年的个性化教学中对学生进行品格塑造、思维训练的精髓仍值得研习。

5. 学业评价：交融传统的以人为本

牛津大学一直致力于培养“全人”、“绅士”、“精英”，其教育目的不在于使学生为将来的某一职业做准备，而在于帮助学生以更完满的人性、更充实的理性去应对人的整个生活。这种理念也渗透进了牛津的考核体系中，早在19世纪中期，牛津大学便宣称“考试已成为主要的工具，它不仅用来测验学生的熟练程度，也用来刺激和指导学生的学习”^[32]。到今天，经过历史的洗礼与验证，牛津大学的学生评价方式既传承了过去，又立足于当下。它通过融合自身传统特色的多元化考核体系，筛选招收全球各领域的顶尖学生，并促使其不断发展成为世界级高层次的精英人才。

在招生阶段，牛津大学以水平考试、素质面试为主。由于牛津自创办以来便致力于培养社会精英，

因此对生源质量要求很高。在水平考试中，申报者必须在普通教育证书高级水平考试中有3门课程达到“A”或2门“A”和1门“B”的水平。此外，有的学院还需加试。加试的题目一般为主观题，考察学生的理解、分析、应变和写作能力。而面试主要考查学生是否思维敏捷、灵活机变、谈吐优雅，这也与其注重培养绅士的传统相关。面试的问题大多是为测试申请人的发展潜能而设计的，但有时也会异乎平常，如牛津法律系考官便曾问学生：“如果有人撞向灯柱，将会对社会产生什么影响？”^[33]同时，牛津有尊重学生个性的传统，因此，如果申请人有一技之长，如擅长踢足球、弹钢琴等，相对而言会更占优势，还能因此申请到更高的奖学金。

在教学阶段的考核上，牛津创设初期，主要以口试为主，即与一位老师进行辩论。这一传统发展到后来成了牛津课堂教学和导师教学的一种重要模式。对笔试的重视以1800年的《公开考试规则》为标志，要求本科毕业生统一参加荣誉级别和及格学位两种考试，成绩分为一、二、三等，并在考试结束后公开。而现在，牛津大学实行学年学分制，大多数课程和讲座都是选修课，学生只需在规定年限内修满足够的学分即可。当然，学分的获得也绝非易事，学生的课堂表现、平时作业、论文水平、课外活动的参与情况以及导师的评价都十分重要，每一项都需主动性和创造力，只有积极行动和思考，才能获得好成绩。而硬性的大型笔试，现今牛津大学的本科阶段一般有两次。第一次在第一学年末尾，类似于资格考试，学生如果成绩不通过，就会被淘汰。这场考试的另一目的是帮助学生总结反思一年的学习情况，因为其后两年内都没有大型考试，学生便可由此确定专业发展方向，利用这段黄金时间探究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充分发展兴趣专长。而第二次考试则是最后一年末尾的毕业考试，要考好几天。到最后一场时，学生的亲戚朋友一般会等在门外，待学生考完出来，便拿出香槟庆祝。

同时，牛津的考试也融合了其悠久的传统。至今，学生们参加考试都还必须穿学袍。对牛津人而言，这不仅是一种形式，更是教师和学生身份的一种体现。牛津有三种不同的学袍，一般考试成绩优异的学生穿的是有袖子的长学袍，成绩中上的学生穿的是类似于背心的无袖长学袍，再差一点的则只能穿普通黑袍。每次考试结束，如果学生有进步，便可以拿着成绩单去买更高一级别的学袍，也算是对自己的激励。源自于英国中世纪教会的学袍，是牛津人怀旧的表现，更反映出了其对传统的守护。

考试在牛津大学与其说是一种评价方式，不如说是一种教育模式。它植根于促进学生自由发展的古老传统之上，使得学生在考核中更加了解自己，发挥自己的优势特长，获得更多向上的动力，不断朝向“有教养的绅士”发展。

6. 学校管理：锤炼百年的独立自主

英国有着十分浓厚的民主主义文化传统，作为英国最古老的大学，牛津更是以其独立自主的传统理念而闻名世界。牛津大学起源于学者们为了在宗教权利、贵族权利以及民事权利中获得一定自主空间而组成的学者行会，最初即具有一定自我管理的特征。在其创办早期，由于学生都寄住在市民家，干扰冲突不断，为了给学生提供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牛津大学便创造了学院制。虽说由此学院组成了大学，但大学却并不干预学院的具体事务。学院是一个独立的实体，经济上自负盈亏，发展策略上根据捐赠者的意愿、学生的需求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不断调整，管理上民主自治，能独立完成教学任务、进行学生管理和自己推选学院院长。

牛津人始终相信独立自治、学术自由是大学培养精英人才和发展教学科研的基础，因而在其发展的漫长历史中，牛津人争取自治权的事例数不胜数。1354年2月10日至12日，因市民连续3日大打学生，牛津大学向国王爱德华三世申诉，最终被授予了一定特权。至今牛津学生违反纪律仍是由大学自己处理，不归市政当局管辖，并且大学还有选派代表参加市政委员会的权利。^[34]但这不意味着牛津受皇权庇护便会任凭皇权摆布，一旦涉及侵犯其独立自主的事由，牛津人也必定会团结一致、据理力争。1688年10月25日，莫德林学院因成功抵制了詹姆斯二世强迫学院推选天主教徒为院长的企图，而将该日设为“复兴日”，以后每年都举行庆祝仪式。

到现代，经过几百年的锤炼，牛津大学的独立自主的精神愈发熠熠生辉、使人折服。1996年，沙特阿拉伯富翁瓦菲支·塞义德曾提出要为牛津大学捐赠340万美元建一所“世界级的工商管理学院”。而在同年11月5日的投票表决中，259票反对214票赞同的结果否决了该项提议，原因是校监们认为“有着古老传统的牛津大学应该远离沾满铜臭味的工商教育”^[35]，教育应立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不是使其为赚钱做准备。

800多年来，在与外界不断的冲突、融合与斗争中，牛津大学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精神，为自身争得了独立自治的权利，也为学者们提供了研究学问的学术自由和物质基础。牛津大学前副校长威廉姆·

D·麦克米伦曾评说，“牛津大学是一个复杂的自治机构。学术自由和学院制的独立在这里根深蒂固”^[36]。独立自主的精神是牛津大学守护自由教育理念的必然结果，也是其能保持世界一流水平的根源。

三、牛津大学坚守自由教育传统的启示

自由教育对于大学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凡处在世界顶端的大学，无不崇尚自由教育并以此培养杰出人才。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直到19世纪末才在中国出现，它们都是以实用学科为基础而建立的。作为一种指向灵魂的教育理念，自由教育的思想自中国大学产生之初起就是缺失的，这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关。中国传统文化重实用轻理论，重技术轻原理，重发明轻发现，这是近代以来世界重大科学发现基本上不出现在中国的文化原因之一。这种传统文化的影响对于自由教育地位难以在中国确立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而自由教育传统的缺失也是中国至今没有出现世界顶尖大学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牛津大学的发展历程中，自由教育的传统对其影响深远。安德鲁·汉密尔顿曾说：“这种在保存、依靠传统的同时努力不断向前发展的哲学是牛津大学的战略中心。”^[37]自中世纪起，牛津大学便秉承独立自主的精神，以培养社会精英人才为目标，以学院制和导师制为模式，以“七艺”、古典学科、人文学科为核心开设课程，培养了大批德性与理性兼具的精英人才。无论社会如何怀疑自由教育的价值，如何挑战其独立自治的权威，牛津大学仍始终如一地坚守捍卫着自己的信仰，将自由教育延续至今，这是牛津大学之所以能历经800多年而久盛不衰的重要原因。与功利主义、工具主义相对，牛津大学始终注重传授普遍知识，守护、传承和发展自由学术传统，并由此捍卫了其世界一流地位。这种成功的经验对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有诸多启示。

1. 积淀先进的大学理念

“大学的性质、使命和目标是与大学的办学理念分不开的。有什么样的大学理念，就会有什么样的大学教育实践。”^[38]牛津大学的成功与其自由教育的办学理念是分不开的，无论是在培养目标、学科设置、教学模式、学生管理、学业评价还是在学校管理上牛津大学对自由教育传统的守护都有着充分体现。大学的理念是大学的思想与追求，是其行为的

方向。大学若没有自身真正信奉的理念，就难以称为大学。近年来，在我国“双一流”建设的热潮中，许多高校在人、财、物上做了诸多努力，而意识到要改变思想观念、形成属于自己的办学理念、办学目的和发展战略的却少有耳闻。正如丁学良所言“中国大学最缺的是理念”^[39]，世界一流大学并非短时间内可以企及的，除了要有一流的学者、先进的教学科研设备、丰富的馆藏图书和充足的经费外，还必须拥有自己先进的、独立的大学理念。一流资源只有在一流理念的引领下才能发挥作用、体现优势，成就一流的大学。

2. 合理实施精英教育

区别于数量意义上人数较少或规模较小的高等教育，今天的牛津更关注质量意义上的精英教育，其精髓在于培养人的精英意识而非赋予人的精英身份。作为精英人才的摇篮，牛津大学的精英教育与自由教育是相通的，它招收优质的生源，定位于培养有教养的绅士，并通过精英化的学院式管理、导师制教学给予学生知识的传授、品格的浸润和情感的联结。在政治论盛行的今天，牛津从未放弃延续其百年的精英品格。纵使外界批判其“固执”、“保守”，这所学校仍坚守着自由教育的初心，绝不由于钱权的诱惑而对学生进行趋向某种职业的功利性教育。而事实上，正是这种看似古板和不切实用的教育，使牛津大学培养了诸多精英人才，包括27位英国首相，5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60多位国际领导人。

当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弥漫着功利主义、工具主义的尘嚣，学生进入大学的目的越来越直接地指向就业，许多大学也越来越追求专业与社会产业的契合度，这种现象令人担忧。弗莱克斯纳指出，“大学不是风向标，不能什么流行就迎合什么。大学应满足社会的需求，而不是它的欲望”^[40]。借鉴牛津大学的经验，在大众化高等教育中贯穿精英教育，是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必然选择。时代的潮流也许会在历史的进程中褪色，而真理却将永存。大学在自由教育理念的指引下实施的精英教育，引导人追求真理、塑造品格，将人从各种情欲中解放出来，获得整全的知识，从而了解自己、发展自己、成为自己，而这恰恰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学生培养目标。

3. 坚守大学的传统文化

“牛津的历史就是一部英国史，西方文化艺术的每一次思潮，都可以在牛津找到一些痕迹。”^[41]作为英国最古老的大学，牛津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800多年的时光在这片土地上流转飞逝，沉淀出莘莘学子心中最清雅的书香和最古朴的城墙。走进牛

津老校区的大门，人便有一种自成世界的寂静感，于每一片凹凸不平的砖瓦上，于千万学者曾进出过的校舍里，于日光与时光的交相辉映中，仿佛可以感受到英国女王巡视牛津时的威武浩荡，亚当·斯密论及《国富论》时的眉宇飞扬，以及霍金写下《时间简史》后仰望星空所见的永恒与流觞。这样浓厚的文化氛围充分说明了，大学不仅是客观的物质存在，它更应该走进人的内心，成为人能感知的文化与精神。牛津大学以其独特的文化氛围启发着无数学子的哲思，滋养和培育出了一代代成为自己的大学人。大学传统文化的传承对于大学至关重要，“专业知识为我们奠定起步的基础，而文化则像哲学和艺术一样将他们引向深奥高远之境”^[42]。牛津大学深知“传统习俗是人们永久的智慧，尊重传统意味着尊重人类整体的文明成果和群体长期沉淀下来的智慧，人类的进步不是凭空的，是由历史文明滋养着的”^[43]。中国的大学也应不断通过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培育人才，夯实自身，方可历经变迁仍能彰显无限的生机与活力。

参考文献：

- [1][2] 亚里士多德. 形而上学[M]. 吴寿彭,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4-5,3.
- [3] 刘春华,张斌贤. 西方自由教育传统之演变[J]. 高等教育研究,2015,(10):75.
- [4] 陈洪捷. 德国古典大学及其对中国大学的影响[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49.
- [5][9][10][11] 纽曼. 大学的理想[M]. 徐辉,顾建新,何曙荣,译.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27,40,114-115,86.
- [6] 赫钦斯. 美国高等教育[M]. 汪利兵,译.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55.
- [7] 彭道林. 大学教育与自由知识[M]. 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2013:48.
- [8] 阿什比. 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M]. 藤大春,藤大生,译.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39.
- [12] BROCK M G,CURTHOYS M C. The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7:290-291.
- [13][21][24][29][31] 周常明. 牛津大学史[M].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131,136,93,11,112.
- [14] Strategic Plan 2013-2018[EB/OL]. <https://www.ox.ac.uk/about/organisation/strategic-plan?wssl=1>.
- [15] 林湘北. 游学牛津[M]. 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4:286.
- [16] 彼得·扎格尔. 牛津历史和文化[M]. 朱刘华,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05:8.
- [17][37] 安德鲁·汉密尔顿. 融古通今:牛津的传统与创新[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1,(6):20,20.
- [18] 恩雅. 世界名校精英榜[M].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2:20.
- [19] 褚宏启. 教育现代化的路径[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199.
- [20] NEWMAN J H.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114.
- [22] ERIC A. Technology and the Academics [M]. London: Macmillan Press,1936:9.
- [23][25][27][30][34] 裴克安. 牛津大学[M]. 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3,19,87,86-87,27.
- [26] 爱弥尔·涂尔干. 教育思想的演进[M]. 李康,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59-165.
- [28] DAVID P. The Oxford Tutorial: “Thanks, You Taught Me How to Think”[M]. Oxford: OXCHEPS, 2008:14.
- [32] 奥尔德里奇. 简明英国教育史[M]. 诸惠芳,李洪绪,尹斌苗,译.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58.
- [33] 何梅. 牛津大学人才培养的历史传统与现代走向[D].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2005:13.
- [35][41] 郝书辰. 从感悟牛津看世界一流大学学什么[J]. 中国高等教育,2006,(20):27,29.
- [36] 威廉姆·D·麦克米伦. 21世纪大学的学术战略:牛津大学案例[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25.
- [38] 单中惠. 外国教育问题史[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417.
- [39] 丁学良. 我们的大学最需要什么[J]. 中国改革,2001,(11):51.
- [40] 祝春华,孙大廷. 品读牛津大学保守性成因[J]. 现代教育科学,2006,(1):37.
- [42] 怀特海. 教育的目的[M]. 徐汝舟,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1.
- [43] 爱德蒙·柏克. 法国革命论[M].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45.

(本文责任编辑 曾甘霖)